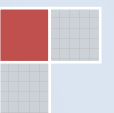


08  
01

# 精文悦读

月刊

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  
综合办公室  
2008-1-28



---

## 本期目录

### 【长短书】

解放思想 勇于创新-----03

### 【精文书架】

《文化与变革》:为精文投资的企业文化建设寻找它山之石-----05

《文化的重要作用》:文化到底有啥用-----09

### 【双语经典】

Success is a Choice -----11

### 【三博堂】

牛根生博客:中国企业成长的力量在哪里-----13

俞敏洪博客:为生命背后那神圣的使命感而活着-----14

### 【文化专论】

陈志武: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16

## 精文长短书

### 推陈出新是解放思想的根本

自从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的崭新论断以来，解放思想又一次成为新时期神州大地的嘹亮号角。日前，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为政治局委员且同样刚刚履新的三位地方要员，不约而同地强调“解放思想”对新一轮发展的关键意义，此中意味深长。走过了十三个年头的精文投资，要在百舸争流、千帆竞发、不进则退的竞合时代，永葆本色不变、再创佳绩、基业长青，就必须牢牢抓住解放思想这一立业法宝不动摇，咬住推陈出新这一战略目标不放松。

解放思想要求我们敢于推陈。所谓推陈，就是要敢于打破传统、勇于反思经验，善于修正习惯。

精文投资的十三年探索，特别是近年来的励精图治，使公司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打造了很好的成长性。无论是在经营模式、盈利能力还是管理创新和保值增值，我们用汗水智慧创造了坚实的业绩基础。这是我们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也是我们不能忘却的历史根本。但是，面对文化产业的新一轮发展，我们不能躺在功劳簿上自鸣得意，不能在现有成绩面前骄傲自满。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更加复杂的经济环境，需要我们善于突破自我、敢于打破陈规、巧于寻找蓝海。

我们要在正视成绩的前提下，对走过的道路、取得的成绩、形成的习惯进行严厉地反思。我们要反思，在历史的摸索中是否错失了重要的机遇；在打造成长性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地方曾经有过疏忽；在管理创新中，还有哪些不够到位的地方；我们已经形成的行为习惯，还有哪些尚不能适应当前特别是未来的竞争；我们在制度建设上还有哪些不够完善的地方，还有哪些是仅仅停留在纸上、墙上？我们还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大胆突破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大胆摒弃影响效率的行为习惯，大胆扬弃被实践检验为低效甚至无效的管理模式，勇于放弃曾经被证明有效但与当下和未来不相黏合的传统经验。反思是痛苦的，反思之后的突

破更有刮骨疗伤的疼痛，但是唯有坚定地告别过往，才能创造灿烂的未来。

解放思想更要求我们善于出新。推陈只是手段，出新才是目的。只有对历史和现状有了深刻的理解，才能对现实有着更加清醒的判断，才能对未来有着更加得心应手的把握。当今世界，文化产业方兴未艾，创意经济风起云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党政国策，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社会共识。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创造新模式、探索新路子、寻求新办法、解决新矛盾。

解放思想的前提就是要在新的历时起点上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作出新判断。这一新判断不能是人云亦云地鹦鹉学舌，而是基于专业的研究之上、基于对公司现有能力的清醒判断之上，在深入领会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基础上，形成符合公司实际的新看法。

我们要认真思考国家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大部制对国有企业管理模式改革创新的新要求。大胆寻求与新的历史时期相适应的管理模式、体制机制；大胆探索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国策相配套的运营模式；大胆打造基于互联网技术和文化创意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盈利模式；大胆创造各种体制机制的创新空间，启用新兴人才，实现人才结构的优化，探索运作团队的集群效应。我们要以改革创新的视野看待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总体趋势，摒弃对新技术、新业态的保守心理，全力以赴研究新技术新业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联，打通行业内部、行业之间由于行政传统和观念习惯形成的沟通壁垒，实现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的创新整合。只有创新敢想，才能发现没有资源就是最大的资源；只有大胆敢思，才能找到整合社会资源的新路子新办法。信息社会、网络时代，不仅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更重要的是拉近了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原本松散的联系，而且加速了联合的可能，丰富了联合的方式。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才能穿越历史形成的障碍与壁垒，创造性地合纵连横，顺应文化产业广关联的特定产业规律，在产业链条的延伸和联动中创造单打独斗无法比拟的规模价值。我们始终应该铭记：整合创造价值，合作诞生兴旺。只有解放自己，才能整合世界；只有善于合作，才能做大企业。

春回大地，大鸾翔宇。解放思想竞风流，推陈出新显神威。

## 精文荐书

### 为精文投资的企业文化建设寻找它山之石 ——分享《文化与变革》的阅读乐趣

打造一个具有执行力、影响力且持续有效的企业文化，几乎是每一个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的梦寐以求的目标。对于每一个把自己的人生梦想与企业成长紧紧焊接在一起的员工来说，也无不在追求一种适意的工作环境和交流氛围，这种追求，说到底也是对良好企业文化的渴望。可是，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大部分企业的文化不仅不能让管理层省心，同时也很难让员工满意。难道是这些企业都不重视企业文化吗？不，回答是否定的。君不见，几乎每一个有追求的企业都在努力地彰显自己的文化追求，从墙上的标语到 CI 企业形象，从员工的着装到午后茶歇的精心准备，种种努力不可谓不用心良苦甚至竭尽心智。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企业文化躺在抽屉里，埋在电脑里，停留在墙上呢？这是一种宿命，还是我们的钥匙生锈了？

不要沮丧地以为，这些问题只发生在自己的企业里；更不要仅仅出于自己的偏见地认为，这些问题只发生在国有企业里，只发生在中国的企业里。研究显示，被这一问题困扰几乎是每一个企业的共同命运，只不过有一些企业很幸运也很得法地找到了实现突破的钥匙而已。不信，我们一起来读读《哈佛商业评论精粹译丛·文化与变革》一书。

本书通过八个鲜活生动的案例，从正反两方面分别就企业文化建设中面临的八种困境，提出了各自相应的管理探索和实践指导，以应对企业文化的各种痼疾。

保罗·F·利维在《“坚果岛效应”：当优秀团队误入歧途》一文中，以坚果岛污水处理厂的案例分析了一种破坏性的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使一个高度一致的富有责任感的团队与高高在山遥控指挥而显得置身事外的管理层产生深刻的疏

离和尖锐的矛盾，互不理解、互不信任、互不买账使得原有的契合慢慢瓦解，直至最后通过消极怠工的方式终告破裂。保罗根据问题的展开进程精致地描述了矛盾升级的五个阶段并逐一进行了望闻问切，然后对症下药地提出了如何防范和化解“坚果岛效应”的药方。

曾经先后担任过四家万豪酒店总经理的万豪集团副总裁比尔·芒克先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管理实践反思，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如何改变做表面功夫的企业文化”，并且展示了其解决方式的独特性和卓越性。文章描述了万豪集团通过授权培养经理层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建立平衡的成功经验。万豪集团通过给予各级经理们更多的自主权、更大的灵活性从而激发更大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促使并信任员工在工作和生活中建立起崭新的平衡，既改变了终日碌碌无为却身心疲惫的精神状态，也极大地创造了企业的发展价值。

一个工作有热情，而且知识和能力轻松地做出改变的职员却令人困惑地拒绝任何改变。这是为什么？通过《在人们拒绝变革的真实原因》一文，来自哈佛大学的两位组织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人们拒绝变革并不真正在表达反对，也不完全是因为人性中的懒惰和松垮。其实，很多人内心是渴望变革的，只是下意识地防备变革可能带来的利益冲突。换句话说，许多人做了自己假想困境的观念奴隶。作者通过本文提醒管理层，不能对员工的此种心态掉以轻心更不能嗤之以鼻，而要遵循“心病还需心药治”的原则，以切实的保障、诚恳的沟通帮助员工打消疑虑、改变行为。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和工程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黛布拉·E·迈耶森女士，通过长达15年的跟踪研究，为管理层改革现状总结了成功的经验模式，给予了足够深刻警醒的提示。她认为，激进的变革，要通过温和的、低调的、务实的方式推进，并且提出了可以遵循的四种可行方式：“潜移默化的自我表达”，也即领导者通过自己的着装、谈吐、办事风格甚至兴趣爱好，潜移默化地引导员工；“语言柔术”，善于借用别人的言辞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追求，说话中少用“我”而多用“您刚刚说到”也许是一种可行之策；“权变的机会主义”，善于寻找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变革，看准变革的时机非常重要；“善于建立战略同盟”，不单打独斗而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改革梦想寻找同盟实现合力。

唐纳德·萨尔，作为从伦敦商学院转战到哈佛商学院从事企业家管理方向的专家，对企业由盛而衰的机理有着独到的认识。用一句很中国的话来说，萨尔先生认为，往往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就是企业衰败的真正的根源在于企业走向成功的行为方式有着强大的惯性而缺乏对变化的适应性。作者通过《企业为何由盛转衰》一文提出，死死抱住成功的经验往往会导致四种可怕的现象：战略框架变成眼罩，蒙蔽双眼；曾经运转自如的流程在执行中越来越机械；企业领导层与企业员工的良好私人交往和关系变成改革的巨大羁绊；引以为豪的价值观念江华成了教条。萨尔教授提出的良方很简单，不要急着问“我们该怎么办”，而要反复思考“是什么阻挡了我们”。

因为1994年就开始担任贝迪公司总裁兼CEO，凯瑟琳·M·赫德森先生则对改造保守公司有着独到的秘籍。《改造保守公司——相逢一笑》一文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率的解决保守文化之道，充分发挥幽默的力量。赫德森女士在企业文化革新的过程中提出了六条将严肃幽默化的原则：一定有超出我们预想的人乐于趣味盎然地工作；在对文化差异保持清醒意识的前提下，玩笑和笑声是最容易被理解的通用语言；幽默不仅可以帮助领导层建立亲和力，更有可能帮助公司渡过难过；在正式的方案中和严肃的讨论中不要轻视幽默的力量；对幽默的推广要从领导层开始。贝迪的经验不是一句空话，七年的时间，公司的销售增长了一倍，净利润和股本增长了近三倍。看来，相逢一笑不仅可以使宿敌泯恩仇，也可以使公司增业绩。

卡罗尔·拉文·伯尼克女士，凭借自己28年阅人无数的市场营销、新产品开发和战略管理的职业生涯，语出惊人地却又踏实有据地提出重塑企业文化的重要命题。在《重塑企业文化》一文中，她从四个方面描述了自己重塑北美阿伯特·卡尔弗消费品公司的企业文化：通过突出公司已有的好的理念，把企业文化提升到显著位置，并随时予以优先关注；与管理团队一起，创造性地设立了“成长发展导师”这一职位，每一位导师通过富有亲情感和责任感上传下达融合员工与领导层的分歧，并通过彰显这一职位对公司的影响力而增强这一岗位的吸引力；定期在员工中开展需求调查并及时进行反馈与回应；有了成绩就及时表彰，最佳导师不仅可以获得相当分量的公司股票，也有各种形式的即时奖励。

《征服议而不决的文化》，是本书最后一个重要案例。西方人有一句很流行的话，“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mportant”（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我不敢反过来说，最后的就是最重要的。但是征服议而不决的文化在崇尚清淡的中国文化语境和特别关注领导怎么说的国有企业，却无疑具有更多一些针对性。本文作者拉姆·查然先生作为美国诸多驰名中外的企业高层的管理顾问，比如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通用电器、杜邦，和中国人不怎么知道但同样重要的 Home Depot 和 EDS 先后都聘请他担任战略顾问。丰富的管理经历和出色的总结提炼能力，使得查然先生对企业议而不决文化的分析富有极大的穿透性。文章指出，企业发展遭遇的最大的阻力莫过于执行过程的失败或梗阻。而真正的原因是预想达成共识、得出结论的沟通未能产生积极效果。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已经成为企业文化的血液。要想攻克高地，查然先生奉送“葵花宝典”三招：一是领导者与他人（包括外人）交流时必须真诚；二必须保证企业的内部运营机制（会议、评审、交流等员工参与的各种形式的活动）能使员工真诚对话；再次，领导者必须利用反馈和跟进来奖励成绩突出的员工，指导遇到困难的员工，改变阻碍公司前进的员工的观念和行为。真理都是看上去简单，但知易行难，宝典效果如何，取决于行动。

现在，我们需要把目光从遥远的大洋彼岸收回，定格在我们安身立命的精文投资这样一个家园。正在继承、改进和创新企业文化的精文投资，完全有必要、有可能从本书中找到镜鉴、界碑和良方。

《文化与变革》是一面镜子，八个企业的八个案例实际上展示了一个企业在致力于企业文化建设的不同阶段、不同侧面可能的众生相。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审视企业文化建设取得的经验、被忽视却持续产生效应的机制、尚需改进的方面以及某些必须调整革新的局部。比较是发现的基础，镜鉴是自审的前提。

《文化与变革》是一座界碑，学界和商界以及学商两栖的杰出之士，通过本书为我们展示了企业文化建设可能遭遇的陷阱、可能出现的困境、已经被证明而且还在持续被证明误区。这些犹如一座座界碑矗立在前，提醒我们，精文的文化建设何处有地雷，何处要拐弯，何处要加油，何处要歇息。

《文化与变革》是一剂良方，看并不是目的，审视为了改正。有了一批先行

者、杰出探索者为我们提供远程会诊，我们需要通过他们的提示发现病灶，通过他们的药引寻找良方。有着完全不同的知识背景和价值观念的中西医近年来，却难得地一个问题上越来越有共识：任何疾病的治疗首先是也必须是自我治愈。一个没有自愈愿望、不会寻找自愈方法的人是无药可救的。对于我们而言，正在奋力前行、蜗行摸索，借一双慧眼发现问题，只要众志成城，就一定会在打造和谐、执行、诚信和创新的企业文化中创造出令人神往的业绩。

对此，我深信不疑！

## 文化有啥用 ——与您分享一本好书《文化的重要作用》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专门论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成为一个热门词汇，甚至到了无人不谈、无时不谈的地步。“经济是基础，文化是灵魂”已经代替“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民生”代替了“文化就是唱唱跳跳”，等等崭新的理念成为党政领导和学界的新共识。这是文化的幸运，也是国家民族的幸运，还是老百姓的幸运。

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否也一直有一种困惑：文化有这样的威力吗？文化的作用怎样显现？到底什么样的文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怎样促进？什么样的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阻碍作用，在多大程度上有阻碍作用，怎样阻碍？

如果您想对这些问题有所回答，如果您想寻找解决这些困惑的钥匙，那么，由塞缪尔·亨廷顿和劳伦斯·哈里森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或许就特别值得一读。

本书几乎囊括了当今世界在文化研究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中西方专家的核心观点。编者之一的亨廷顿是哈佛大学赫赫有名的专家，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的文化冲突是冷战后国际间冲突的主要形式和根本原因的观点，曾经引爆伊斯兰世界的激烈反弹，也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文化使局面几

乎完全不一样》的作者戴维·兰德斯是名著《国富国穷》的作者，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教授，创建并领导哈佛商学院饮誉世界的竞争与战略小组；《社会资本》一文的作者同样来头不小，中国读者对他颇为熟悉，他就是苏联刚刚解体就迅速推出名著《历史的终结》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学界对他爱恨有加；另一位编者劳伦斯·哈里森，也是本书绪论《文化为什么重要》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文化变革》的作者，他的名著《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曾经在经济学界、欧美拉美问题专家和拉美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一场持续的抗议风暴，但最终事实胜于雄辩。因为哈里森先生不是信口开河，他的结论基建于长达 16 年的职业实践和深入思考：从 1965 年到 1981 年的整整 16 年，他一直担任美国国际开发署驻拉丁美洲五个国家的代表团负责人。本书《多种现代性：东亚现代性涵义初步探讨》的作者更是不得不提及，他是华裔研究界能够在核心问题上进入当代国际学术前沿并具有足够影响力的少数学者之一，他就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杜维明教授。因为 1988 年担任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首届华语大专辩论赛主席和点评嘉宾而为国人熟悉。而提出“文化是制度之母”作为本书点睛之笔的喀麦隆人埃通加-曼格尔·丹尼尔，是非洲研究、开发和管理协会的创办人并长期担任会长一职，曾经还担任过世界银行非洲顾问委员会委员，丹尼尔先生直接或者间接参与非洲西部、中部和南部五十多个开发项目的工作，对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影响有着切身的体会。

值得一提的是，与一般专家学者为了理论研究而自述机杼的专著深奥难懂完全不一样，本书关注现实、务实理性。它集中了近几十年来国际学者对美洲、非洲、亚洲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观察而显得生气逼人，对于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前后对比的中国读者，更有一种切身的体会。同时，作为 1997 年哈佛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的一次交流讨论的思想凝结，本书充分展示了学者们因为国别、经历、学识和教育差别而对文化问题各有各的看法。但是，正如著名文化学、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先生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上世纪 60 年度），关于文化的定义有 170 种之多，本书呈现的差异、矛盾甚至激烈冲突是这个时代各种观点交锋的反映，也是这个时代多元丰富的一种表达，更是文化复杂性的体现。

《人论》作者恩斯特·卡西尔先生关于“人是符号的动物，是文化的动物”的观点曾经震撼并吸引了大批中国读者。既然我们“逃不脱”文化的纠缠，在新一轮社会进程中，我们就完全有必要深入了解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复杂而又可以认识掌握的关联，而不是人云亦云地传递似是而非的错讹常识。

同样重要的是，作为专注于文化产业投资、推动文化事业发展的精文人，我们更有必要、有责任了解掌握更多的文化的奥秘，《文化的重要作用》或许会让我们的工作更主动一些，让我们的人生也更文化一些。

书籍信息：

《文化与变革》，《哈佛商业评论》精粹译丛

孙震 赵新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8月版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美]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主编 程克雄译

新华出版社 2003年3月版

**双语经典 励志驿站****SUCCESS IS A CHOICE  
(ANONYMOUS)**

All of us ought to be able to brave ourselves for the predictable challenges and setbacks that crop up everyday. If we expect that life won't be perfect, we'll be able to avoid that impulse to quit. Even if you are strong enough to persist the obstacle course of life, sometimes you will encounter an adverse event that will completely knock you on your back.

Either it is a financial loss, the loss of respect of your peers or loved ones, or some other traumatic events in your life, these major setbacks leave you doubting yourself and wondering if things can ever change for better again.

Adversity happens to all of us, and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Some form of major adversity is either going to be there or it's lying in wait just around the corner. To ignore adversity is to succumb to the ultimate self-delusion.

But you must recognize that history is full of examples of men and women who achieved greatness despite facing obstacle so steep that could have crashed their spirit and left them lying in the dust. Moses is a stutter, yet he was called on to the voice of god. Abraham Lincoln overcame a difficult childhood, depression, the death of two sons, and constant ridicule during the Civil War to become arguably our greatest

president ever. Helen Keller made an impact on the world despite being deaf, dumb and blind from an early age. Franklin Roosevelt had polio.

There are endless examples. These were people who not only looked adversity in the face but learned valuable lessons about overcoming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and were able to move ahead.

### 成功在于选择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能够应对随时涌现的各种可以预见的人生挑战和生命挫折。如果真正懂得生命永难完美的道理，我们或许能够避免因承受不了而冲动放弃。然而，即便你强大到满以为可以应对工作中生活中层出不穷的难题，也保不准一个防不胜防的灾难就会让你趴下。

磨难可能是经济上的损失，也可能是同仁亲友的看轻，还可能是别的糟糕透顶的事情，凡此种种，都将使你深深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让你看不到事情还有好转的机会。

磨难不会放过任何人，而且往往随时而至。很多磨难不是迎面向你扑来，就在不经意处等你上钩。漠视不幸就是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

然而，我们应该铭记，历经灭顶之灾却卓然而出终成正果的人物在历史上不绝如缕。摩西患有口吃，他却最终成就了为上帝代言的重任。童年凄苦、少年抑郁，两度承受失子之痛，内战期间屡遭嘲讽，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击垮阿伯拉罕·林肯，他以无可争辩的功勋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总统。海伦·克勒创造了人间奇迹，但谁又知道，从幼年开始，她就又聋，又哑，又瞎。而众所周知，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身患小儿麻痹！

战胜厄运终至成功的伟人举不胜举。他们都能够不仅正视眼下的磨难，同时还善于从克服磨难中悟到真知，不断勇猛精进。

### 三 博 堂 BOSS 博客 博雅

#### 牛根生博客：中国企业成长的力量在哪里？

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55dac201007sws.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55dac201007sws.html)

这就要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去搜寻，在此我总结了中国企业成长的“十大力量”，与大家交流。

**第一个力量：市场的力量——谁主宰中国市场，谁就能主宰未来。**

两条理由：一是中国市场全球最大，二是我们拥有本土优势。

**第二个力量：战略的力量——谁最善于聚焦，谁就最善于崛起。**

理由：全球格局中居竞争弱勢者，四面出击不可能赢，集中一点最可能突破。

实证：所有体育比赛的冠军只选一个突破点。

**第三个力量：能人的力量——谁掌握人才，谁就能掌握主动。**

理由：事在人为。

实证：在某一市场上，哪家企业安排的人最能干，哪家企业就能成为本市场的第一品牌。

**第四个力量：制度的力量——谁解放生产力，谁就能解放竞争力。**

理由：制度好，坏人可以做好事；制度不好，好人也可以做坏事（邓小平语）。

实证：为别人干，要解决“双因素”问题：既要解决态度问题，又要解决能力问题。为自己干，只需要解决“单因素”问题：态度问题自动解决，只剩能力问题。

**第五个力量，价值观的力量——谁让别人赢，谁就能让自己赢。**

理由：交换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和谐是人类的最高追求。

**第六个力量：学习的力量——谁快速学习，谁就能缩小差距。**

理由：后发国家，后发企业，学习是最好的捷径。

实证：西方学习中国的四大发明；美国因学习英国而发展，日本因学习世界而发展。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实际上是学习美国的结果，美国人戴明的学说，影响了整个日本。

**第七个力量：借兵的力量——谁善于骑马，谁就能日行千里。**

理由：赶路坐车，过河靠船，谁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实证：《三国演义》中，孙策向袁术借兵，开拓了江东基业。

结论：穷人要向富人借钱，弱企要向强企借兵，发展中国家要向发达国家借力。这正是改革开放的意义之所在。

**第八个力量：借势的力量——谁顺应潮流，谁就能矗立潮头。**

理由：顺势而为，15%的努力 85%的收获；逆势而为，85%的努力 15%的收获。

**第九个力量：品牌的力量——谁负多大责，谁就能树多大牌。**

理由：你不关心国家民族的事，老百姓也就不会关心你的事。

**第十个力量：创造的力量——谁自主创新，谁就能后来居上。**

理由：我们是后发国家，后发国家后来居上只能靠一条：软件革命。

## 俞敏洪博客：为生命背后那神圣的使命感而活着

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1b54e0100074k.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1b54e0100074k.html)

当我们在饭桌上品尝美味的三文鱼时，也许很少会想到关于它们的令人感动的生命故事。

每四年一次的十月份，加拿大弗雷瑟（Fraser）河上游的亚当斯（Adams）河段，平静的水面变得沸腾起来，成千上百万条三文鱼（sockeye salmon）从太平洋逆流而上，来到这里繁殖后代。三文鱼银白色的鱼身在逆流而上的过程中变成猩红，整个水面因为有太多的鱼而变得一片红色。

三文鱼的一生令人惊叹！从鱼卵开始——每条雌鱼能够产下大约四千个左右的鱼卵，并想方设法将其藏在卵石底下，大量的鱼卵还是被其他鱼类和鸟类当作美味吃掉——幸存下来的鱼卵在石头下度过冬天，发育长成幼鱼（fry），春天来临时便顺流而下，进入淡水湖中，它们将在湖中度过大约一年的时光，然后再顺流而下进入大海。在湖中它们尽管东躲西藏，但大多数幼鱼依然逃不过被捕

食的命运，进入湖中的每四条鱼就有三条被吃掉，只有一条能够进入大海。危险并没有停止，进入广袤的大海，也就进入了更加危险的领域。在无边无际的北太平洋中，它们一边努力地长大，一边每天要面对鲸鱼、海豹和其他鱼类的进攻；同时还有更加具有危险性的大量的捕鱼船威胁着它们的生命。整整四年，它们经历无数艰险，才能长成大约三公斤左右的成熟三文鱼。

成熟之后，一种内在的召唤使得它们开始了回家的旅程。十月初，所有成熟的三文鱼在弗雷瑟河口集结，浩浩荡荡游向它们的出生地。自进入河口开始，它们就不再吃任何东西，全力赶路，逆流而上将会消耗掉它们几乎所有的能量和体力。它们要不断从水面上跃起以闯过一个一个急流和险滩，有些鱼跃到了岸上，变成了其他动物的美食；有些鱼在快要到达目的地之前力竭而亡，和它们一起死去的还有肚子里的几千个鱼卵。最初雌鱼产下的每四千个鱼卵中，只有两个能够活下来长大并最终回到产卵地。到达产卵地后，它们不顾休息开始成双成对挖坑产卵授精。在产卵授精完毕后，三文鱼精疲力竭双双死去，结束了只为繁殖下一代而进行的死亡之旅。冬天来临，白雪覆盖了大地，整个世界变得一片静谧，在寂静的河水下面，新的生命开始成长。

三文鱼的一生，充满了危险和悲壮，它们克服种种困难，躲避无数危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逆水搏击，回游产卵，为自己的生命划上句号。也许这样做是遗传和基因使然，并不是一种自觉的精神意识。但这一现象在人类眼里看来，依然令人感动，使我们思索和振奋。三文鱼的一生，贯穿着明确的生命主线：成长，不管各种艰难险阻的成长；经历，不管大海多么不可预测，也要从平静的湖水游向大海去的经历，去完成生命各个阶段的历程；使命，不管多少险阻都要完成一生的使命，返回出生地来繁衍后代，哪怕以生命为代价。这一生命的主线使得三文鱼的一生变得壮观。

人类生命的过程中，也应该有非常明确的生命主线，我们应该努力成长，不惜一切代价使生命变得成熟；为了成熟我们应该去经历，经历自然、人文、社会和历史，使我们的生命变得完美；我们更需要使命感，活着不仅仅为了活着而已，我们生命的背后有使命存在，这一使命也许各不相同，但从终极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一致的，是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在和谐自然的世界中更加幸福地生活。也许我们不需要像三文鱼一样以生命为代价，但完成这一使命的神圣，却应该比三文鱼的回游产卵更加严肃和不可动摇。

在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人忘记了自己需要成长，变得懒惰、无聊和平庸；有太多的人忘记了应该去经历，变得胆怯、狭隘和固执；有太多的人忘记了自己

承担的使命，变得苍白、迷茫和失落。那些成千上万在三文鱼回游的季节来到河边的人们，在观看三文鱼生与死搏击的同时，是否从它们身上得到一点点感悟，并且重新开始思考自己生命的历程呢？

## 文化专论

### 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

陈志武

陈志武（1963-）出生于革命老区湖南茶陵，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86年去美国留学，放弃了攻读7年的计算机专业，转而学习经济，并于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曾经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现在是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是第202位，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

几年来，儒家文化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这些讨论不只是限于文化圈内，而是直接涉及到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生每周花多少时间读经、多少时间学习现代知识的问题。此外，要求立儒为国教的呼声也不小，因此信不信儒已不是个人的选择问题，还是一个全社会以及整个国家的根本问题。实际上，一些新儒家学者声称要“以夏变夷”、“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国家已拨款数亿在国外设立孔子学校，以具体行动在世界推广儒家文化。中国这么大，世界更大，做一些这类事情，也未尝不可。但是，其成效将如何则可能是另一回事。

那么，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儒家文化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除了儒家外是否有别的更“好”的社会秩序安排？西方文明真的只是物质文明，而东方文明是更高尚的精神文明吗？“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自由、民主、法治的思想，让中国走近世界一大步。但是，现在人们发现，在当年打倒“孔家店”后，

今天似乎又要重建“孔家店”，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还缺少什么才使个人权利、个人自由难以扎根？

文化显然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比如，今天的中华文化跟汉朝的汉人文化、唐朝的唐人文化、宋朝明朝的中国文化、甚至民国时期的华人文化都不一样，其他种族文化的动态变迁也大致如此。如果文化是不断变化的，那么是什么在推动变迁？为什么有的文化内容经久不衰而有的则时过境迁即消失？这里，我们试图从金融学、经济学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尽量从文化之外的视角来理解文化。我们会发现，文化内涵必然是因某种需要而生，同样会因为某种不需要而死。换言之，一旦文化的某种功能能由其它更受社会欢迎的东西取代，那么那项文化内涵的生命就会结束。我们会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技术的发展，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内涵也会变化。所以，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复古不仅是一厢情愿，且没意义。

### 文化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

文化的内容当然很多很广，我们关心的不是像“川菜”“湘菜”这样的非制度性文化，而是规范言行的制度性文化以及影响人们作价值判断的处世文化。此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不谈及儒家“三纲五常”中的“五常”等处世之道，原因是，像“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规范是世界各文化的普遍价值，并非儒家文化独有，否则我们中国人出国之后就不会有与别人交往的任何基础。这些内容是今天的中国以及任何社会都应该教导的。

本文的反思集中在儒家“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以及相关的“五伦”社会秩序。家文化是各种文化的核心，也是儒家跟其它文化的核心差别的体现。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差别。

不管是远古，还是现代，任何人自出生即面对两种基本需要，一种是吃穿住行这些物质消费，即所谓的物质生活，“民以食为天”；另一种是心理或说精神需求，即所谓精神生活。从生存需要看，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应该第一，精神生活其次。人的这两种基本需要既是文化的起因，也是文化的目的。

所有动物都有其文化，而一种动物的文化程度又跟该动物的个体独立生存能力有关。在所有动物中，人出生后的自生能力可能在最弱之列，婴儿一岁之前靠吃奶，即使一岁之后能吃一般食物、能走路了，在 12、13 岁前一个人还是难以独自谋生。相比之下，马的自生能力极强，小马出生一、两天内即可站立走路，也能很快自己吃草。但尽管如此，出生之后，小马还会追随母亲一、两个月，母马也会给以母爱，保护小马，形影不离，所以，连马也体现出一定的“家庭观念”，“家文化”。笔者小时候在湖南农村，最怕的就是还在抚育一群孩子的母狗，母狗为保护其孩子所表现出的凶恶，真是奋不顾身，任何人只要靠近她家的领地范围，母狗绝对会出来咬你！所以，狗的“家庭观念”也不弱。“家”作为基本生存单元是动物的共性。

当然，对于自生能力远比马弱的人类，家更是人种延续下去的最基本条件。任何今天还存在的民族，它必须有重视家庭的基本文化内涵，否则就不可能延续到今天。各类文化都重视家庭，这是人种生存的基本底线。

除了要满足今天的物质消费和精神需求外，一个人面对的更重要的挑战是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包括未来物质生活所需的收入的不确定性、身体健康的不确定性，还有未来精神生活、心理状态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风险事件可以是天灾人祸，比如，根据邓云特先生在 1937 年《中国灾荒史》一书中的统计在个人层面，生病、交通或工作事故、房子起火等意外事件也会引发财产收入、精神状况上的损失，还有娶媳、嫁女、盖房、养老等这些大开支项目，都是个人一辈子要应对的不好预测的风险或大额开支事件。此外，在创业、生产投资上也会面对大大小小的不确定性，有可能血本无归，有可能收成不好。

这些因自然、社会以及个人自己带来的难以避免的风险事件让人充满忧虑，这就逼着人们去寻找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风险的手段，否则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生存下去的概率就会远小于 100%，社会也不能安宁。大致讲，人类有两种途径规避未来风险，其一是靠发展，“发展是硬道理”，通过提高物质生产力和精神供给量来增加人类整体生活水平，这当然能提升个人度过风险事件的能力。

物资供应有结余时，即使一时发生天灾人祸或生产歉收，也不至于给人造成致命的危机。“硬”技术创新的贡献即在此。

其二是通过个人之间的经济交换、精神交换达到互保、互助、资源共享的效果，以此提升社会共同的避险能力，使个人能更好地度过经济紧张、精神压抑时期。任何社会中，个人间的收入风险特征以及能力都会不同，使他们能通过交换而达到互保、互相配置资源的效果。在精神生活方面也如此，不同人会在不同时候出现喜怒哀乐，为人际间的感情交换提供了基础。

问题是，如何进行交换？在经济利益方面，金融产品就是让不同人（买方和卖方）实现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状态之间的物质交换（当然，在未来也许可以有实现不同时间和不同状态间感情交换的证券）。例如，借贷合同是让贷方今天把钱借给另一方使用，但到期时借方要还本付息，其效果是贷方把今天的收入转移到未来花，借方则把未来收入转移到今天花。其它诸如人寿年金、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养老基金、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虽然合约的支付安排不同，但道理都是实现不同人在不同时间、不同状态间的利益交换。可问题是，这些金融品种直到近代才发展。那么，在古代以及传统社会里，类似这样的金融保险交易和精神感情交易靠什么方式进行呢？这是一个交易风险或者说契约执行问题，如果大家都担心另一方会赖账、不履行其交换义务，那么互保互助交易就无法发生。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所推出的文化与制度基本都是为了保证这些交易能顺利进行。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能力低下，靠狩猎、采摘野果谋生，其收成的风险太高，打猎时可能连续多日一无所获，没食物供给，生存挑战必然是每天的首要问题。如果那时期生产和生活都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那么人的生存能力会极低，人类可能很快灭种。所以，原始部落就成为规避生产风险、规避天灾人祸、提供原始精神消费的基本组织。尽管部落公有制淹没了个人的空间、也没有独立的家，但在当时生产能力的约束下，原始部落可能是最理想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那时没有正式金融契约交易，但部落里共享一切，其实就是基于隐性利益交换的原始社会保险安排。

到了农业社会，可以圈养家禽，在固定地方重复种植粮食，这两类生产技术革新大大提高人类生产力，使物质供应大增，降低了饥饿的频率。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文化也发生变化，人们没必要再继续部落公有制这种经济互助组织。毕竟，为了支持公有制达到分摊未来风险的效果，每个人需要牺牲太多的个人空间和个人自由。只要生产力有所突破，让个人的独立生存能力有实质性提高，人们必然会寻求新的、扩大个人空间的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一种全新的文化也会应运而生。这就是阿玛塔亚·森所说的“发展就是使个人更自由”，也是人性所向。

在农业社会，外部化的法治没有建立，与陌生人交易的成本还太高，商业特别是金融保险、借贷、证券业都不发达，还没有市场提供的互保互助交易。所以，在走出部落公有制之后，还必需找到一种新的保证经济交易、精神交易能顺利进行的安排。这时，家族、宗族就成为主要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亲情与血缘成为保证互保、互助交易能顺利进行的自然基础，家族像是一个非正式的内部金融市场。以家庭为基础性存在单元当然没把个人充分解放出来，不等于个人完全自由了，但“家”可能是那种时代里让个人达到规避未来物质风险、精神风险的最可靠安排。

在任何社会里，家庭有两个主要功能，一个是经济互助，一个是社会功能即精神互助。其经济功能包括两方面，第一，在家庭内部存在各种隐性金融契约关系，父母在后代身上有投资，所以后代有隐性“回报”责任；兄弟姐妹之间则你欠我的、我欠他的等等；这个家欠同族上另一家的，等等，相互间存在许多说不清、也说不完的隐性债务、保险责任。第二，因血缘关系，“家”能大大减少各成员间利益交换的执行风险，减少交易成本。

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它源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2500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

也就是说，在没有市场提供的各类保险、借贷、股票、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金融品种的前提下，成家生儿育女，而且最好是生儿子，就成了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风险的具体手段，即所谓“养子防老”。生儿女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买的保险，儿女是人格化了的金融品种。父母也许爱子，也许不爱，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儿女长大后要“孝”，这是保证父母投资有所回报的关键。“养子防老”是保险和投资的概念，而“孝”则是儿女履行隐形“契约”的概念。以“孝”和“义务”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孔孟为了降低这些隐形利益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安全而设计的。正如谢幼伟先生在《孝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说，“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谓‘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作用之大，地位之高，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真有所知”。

于是，由“三纲”、“五伦”建立并延伸出来的家秩序、社会秩序就很关键了，臣必须服从于君，子必须服从于父，妇必须服从于夫，弟必须服从于兄。这些服从关系是无条件的，也不管有理还是无理。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说法

人出生之前是无法选择家庭和出生顺序的，所以，以长幼定名分、责任所实现的利益交易是非自愿的交易。而强制性的交易有悖于个人权利。

不以个人权利但以名分界定的等级结构，的确让中国社会在 2500 年中基本不变（改朝换代除外），但这种文化也阉割了中国人的个性，阉割了我们的创造力。阉割了个性的结构或许稳定，可代价是中国长期处于温饱和饥饿之间。就以这些年的留美学生为例，我们这些学生以及毕业后留美工作的人，虽然专业水平较高，但跟美国人、印度人、欧洲人相比，儒家文化让中国人往往缺乏个性，习惯于听话，但不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顺从”、“听话”的习惯当然让我们只适合打工。

国粹派喜欢说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而中华文明则是更高境界的精神文明，其根据似乎是西方近代工业科技发达，物质生活丰富，而中国却到近年才解决温饱。——这种逻辑值得商榷，原因很简单，西方物质生产比东方发达并不必然意味他们的精神文明就落后，而东方的物质生产落后也并不必然意味我们的精神文明就先进。会不会是东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落后呢？

我们可从三方面看这个问题。第一，精神生活丰富的前提是精神食粮供给丰富，学术和文学艺术又是其主要源泉。中国的学术两千多年围绕儒、法、墨、道家打圈圈，佛教在汉代逐步进入中国后，曾推动过唐宋时期文学、诗词等领域的发展，也出现过宋明理学的发展，但总体上没离开对早前经典的解读和再解读，并且这些哲学与文学发展基本限于士大夫的小社会内，对绝大多数为文盲的社会的精神生活影响有限。正如著名的新儒学代表人物张君勱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感言的：“然秦后两千年来，其政体为君主专制，养成大多奴颜婢膝之国民。子弟受大家族之庇荫，依赖父母，久成习惯。学术上既受文字束缚之苦，又标‘受用’‘默识’之旨，故缺少论理学之训练，而理智极不发达。此乃吾族之受病处。”（张君勱：《明日之中国文化》第 84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中国并没像西方那样有系统组织的宗教，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儒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在这种缺乏正式的理性与非理性生命观的社会里，大众的精神世界只好由“牛鬼蛇神”迷信来支配，看不出这种精神文明高级在哪里。反倒是汉代进入中国的佛教、明代进入的天主教以及其它基督教扩展了我们的精神资源。退一步讲，“中庸之道”扼杀的不只是物质文明上的创新能力，而且也激发人们不要在精神资源上有“出众”的创新突破。

第二，或许，有没有以宗教或者理性学术支撑的精神文明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把生活重点放在精神追求上，而不是过分追求物质生活。中国人追求的精神生活或许不是宗教性的，而是家庭温暖和亲情。但是，人之间的友情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每个人有不同偏好、不同性格，即使是同父母的兄弟姐妹，性格与喜好也难以相同，他们除了知道彼此是兄弟姐妹而“应该”有亲人关系外，不一定有心灵深处的相通，不一定有出于“自愿”的友情。家庭成员间会因为名分以及相应责任而彼此相依赖，相交往，可是这不等于他们的关系能超出原始情感而达到更高的心灵沟通境界，就像包办婚姻中夫妻知道彼此有责任，是夫妻，但他们之间可能没有“爱”的体验。难以想象在人的个性与自由空间都被压抑的社会里，情感与心理世界能够天马行空，飞翔到朴素感情之外。

第三，中国文化的核心重点在于维护“家”的经济功能，轻视其社交与情感功能，这必然抑制中国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从某种意义讲，连温饱问题都没完全解决的农业社会里，“家”的第一功能当然应该是实现家庭成员间的经济利益交换，所以儒家文化里“孝”、“顺从”、“听话”排在第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也在这里，一旦经济利益交换是“家”的最主要功能，人们容易先看到利益，后才是亲情，或者只看到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夹在“家”中，你搞不清亲戚对你好是真好，还是出于利益。在现实生活里，笔者在湖南家乡看到更多的是因为利益大打出手的儒家家庭，而不是突出亲情、突出情感关系的温情脉脉的儒家世界。那种理想化了的儒家世界在中国还没实现过，从内在逻辑上可能也很难实现。说到底，在儒家文化抑制物质文明发展的情况下，传统中国始终没完全走出温饱的挑战；在那种境况下，说精神情感世界里能达到文明顶峰，那只能是奢望。

传统学问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太多停留在研读经典上，好像研读经典就是了解真实的中国。显然，《四书五经》讲的是“应然”，但“实然”可能是另一码事，就好像不能说基督教《圣经》里的世界就是西方社会一样。书本里的儒家伦理社会当然温情脉脉，充满诗情画意。而真实的中国传统社会里，虽然不“言利”，但实际连“家”里也以利益当头。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儒家“刚性”的“孝”可能反而迫使家庭关系以利益交换为主。

我们可从今天的中国来看到这一点。中国今天实际上包含了許多不同亚文化的社会。去年，杜俊林同学协助笔者对北京、丹东、徐水县以及三个河南村——九连城、牛庄、宋庄作过一次调查，各地随机抽样 300 多人，这些地方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当然是北京最高，丹东市次之，徐水县第三，九连城、牛庄、宋庄最低。

许多家庭交往、社会交往呈现经济交易的内涵。比如，在现代社会中，送礼往往是象征性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大礼”反而是有目的的。但在传统社会中，送礼是一件很认真的事，而且要大，因为“礼尚往来”不只是为了“情”，更多的是一种借贷利益交换。村里人遇到婚嫁、迁入新居等大事时，都会大摆宴

席，然后收受礼金，相当于帮助缓和大开支给主人带来的困难；此后，等对方也有类似大事时，再送去相应数量的礼金。

对六个地方的抽样调查结果是，北京人之间的借贷和礼物往来最少，丹东和徐水次之，农村人之间的借贷和礼物往来最多。因此，前者已不是传统社会，但后者仍然是。特别是在农村，借贷和礼物主要发生在亲戚之间，亲戚之外很少。由此可见，在农村，亲戚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很重，家庭、家族仍然是经济互助中心。

当问他们“你为什么要生小孩？”时，北京只有12%的人说“养子防老”，而三个村平均有69%的人说“养子防老”，丹东和徐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当被问到“你是不是因为爱小孩而生孩子？”时，北京有55%的人说“是”，而三个村平均只有16%的人说“是”，丹东和徐水仍然在两端之间。

通过对总样本的计量分析发现，收入越高同时又买了某种金融保险品种的城市人更容易说“生儿育女是出于感情”，而不是为防老等经济目的。

这说明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有了满足生活需要的收入同时又利用保险品种、投资基金等把夫妇未来的经济风险安排好之后，他们更多把“家”看成是感情交流、满足精神需要的社会单元，原来由“家”胜任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市场承担，“孝道”责任逐渐由“爱”取代，经济与金融发展正在改变这些社会的文化。相比之下，在农村，家庭关系仍然以经济交易当先，“养子”继续是规避未来风险的主要手段，而“家”的情感功能就弱，那里更需要儒家伦理来维系隐性经济交易，于是，那里更保留了儒家价值观。

那么，中国未来的文化走向会是什么呢？是朝着像北京、上海等发达社区的文化发展，还是要恢复儒家传统、走向传统乡村的价值体系呢？社会文化的走向是个人难以设计的，而是由社会的需要决定。

### 金融发展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为了帮助理解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我们可看看经济与金融发展是怎样促进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的。今天北京、上海跟农村的文化差别

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今天跟过去的差别的映射。西方并非历来就以个人为中心，是经济与金融的发展把他们逐渐从对家庭和教会的经济依赖中解放出来。

当然，到今天针对个人的金融证券品种已眼花缭乱，它们的功能目的各不相同。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就以人寿年金（life annuity）为例，这应该是对个人规避未来风险最重要的金融品种之一。想到未来，人最不确定的是到底会活多少，是活到120岁还是70岁呢？如果今天按照活70岁去存钱，万一活到120岁，那剩下的50年的收入从哪里来？如果按照活120岁去存钱，万一活只活70岁，那不是存钱太多？——寿命的不确定性极容易让自己在老年时变成后代的负担，也丧失自己的独立自主性。人寿年金便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出现的，只要购买者证明其今天身体健康，那么他可分期或一次性申购人寿年金，买到后，投资者可在50岁（也可从其它年龄开始）至去世之前每年得到事先约定的收入，比如四万元，这种收入支付可以继续到购买者去世或者夫妇双方都去世时为止。有了这种金融安排，父母就不必依赖后代的经济支持度过晚年，也不用担心自己会不会活得太久，经济独立显然是个人自由的基础。

民主、自由、法治思想与实践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出现，这是我们熟悉的历史，但以往不一定熟悉的是，人寿年金以及其它保险和借贷品种也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出现并发展。按照C.F. Trener在《The 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of Insurance》一书的考证但是，有意思的是，随着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终结，欧洲进入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民主、自由与法治继而由宗教专制取代，人寿年金等金融市场也跟着消失，个人的经济风险、养老等重新由传统的家庭来胜任。比如，从8世纪到10世纪，德国、比利时的宗族极发达，地权归宗族，族产以及成员奉献用于规避个人成员的经济风险，这样做的效果之一是让“家庭”的部分经济交易功能由宗族承担。但是，为支持宗族结构以及重新回到“家”的经济互助功能，其宗法与“家”文化也变得更“刚性”，让个人失去自由与权利，失去个性。

按照Aaron Gurevich的说法从12、13世纪起，威尼斯、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的商业迅速发展，这不仅使他们的人均收入增长，让人们走出温饱的挑战，

而且于 13 世纪后期人寿年金、人寿保险、嫁妆基金等金融品种再次出现在威尼斯等地，等到 14、15 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个人权利意识重现时期，西欧的金融已有相当的发展，为个人实现自由与权利提供了初步的金融手段支持。

各类保险、借贷、债券、投资品种在 15、16 世纪尤其有更快的发展，并扩散到荷兰、法国以及后来的英国。这些日趋成熟的金融工具成为 17 世纪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和进一步个人自由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也是在欧洲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

我们看到，如果要把利益交易从“家庭”功能中剥离，由金融市场取代，这当然能减轻因利益交换给家庭带来的张力，但也要求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种新文化，例如，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律以及保证法治的政权制衡体系，否则，在家庭、宗族之外的市场金融交易就难有交易安全，契约权益无法保障。换言之，如果个人经济风险交易功能主要由家庭来承担，那就对家庭文化有相应的要求，在中国就有了儒家文化；如果这种经济功能主要由市场来承担，那么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必须有相应的内容，在此背景下西方发展出自由、民主与法治，与此同时，西方的“家”越来越成为一个单纯的精神生活细胞，以兄弟姐妹间、长辈与晚辈间的感情交流为基础。

关于个人权利与自由和金融证券在西方是怎样互动发展起来的历史，由于篇幅关系，另文再专门讨论。

当金融市场取代了“家”的保险互助功能，从而使类似于儒家这样的传统文化的必要性降低之后，人们的“生活质量”是否反而不好呢？是否反倒让人变成行尸走肉、醉生梦死呢？新儒家学者最喜欢批判的当然是美国，喜欢拿美国来说明为什么西方文化不可救药而必须由中国文化来拯救他们。美国的保险、银行、证券业是当今最发达的，各类金融产品让美国人把多数能想象到的未来收入风险、生活需要提前安排好。除了医疗、人寿、财产、汽车、失业、残疾等传统保险品种，住房、汽车等个人贷款品种，退休基金、投资基金等证券外，美国的金融与保险业总是不断了解新出现的个人生活或养老需要，根据新需要再推出新金融产品，目的是让个人不至于因意外事件而在经济上拖累亲人。

比如,1990年代新推出的“长期护理保险”(long-term care insurance),其背景是随着人均寿命的上升,退休后许多人还能生活30年或更长,过了70、80岁可能不一定生病,但生活行动可能越来越困难,需要有人在身边护理,此种护理费用是一般医疗保险不包括的。这时,一种可能是要求儿女放弃工作、放弃自己的家,搬回老家照顾父母,如果这样,儿女就要牺牲自己的事业与生活,而且如果每代人都中途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去护理、照顾长辈,那意味着每代人都无法实现自己事业与生活的最大潜力,会是一种让一代一代都不幸福的社会安排。四世同堂如果只是一种抽象的境界,那还可以,但最好不是现实生活。

另一种可能是由保险公司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如果张三从中年开始每年付1500元保费,那么他退休后,一直到去世之前都可根据需去养老护理中心,或请人到自家来护理,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其特点是:保险交易发生在父母跟保险公司之间,而不是在父母与后代之间。这一新的保险品种目前越来越受欢迎。

把隐性和显性的经济交易几乎完全从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中退出之后,父母可以在退休后仍然保留住自己的独立人格,不需要受后代的支配。对于儿女来说,他们也不用感到“孝”的责任压力,但他们出于爱父母还是可能自愿选择去照顾父母。

一旦强制性的经济责任不再存在于父子、兄弟之间,父亲没必要再以一幅威严不可亲近的面孔出现在儿女面前,用不着强制儿女无条件地听自己的话并要求在父母讲话时儿女不能还嘴,而儿女则可从“孔家店”中解放出来。父母与儿女间、兄弟姐妹间因经济利益关系引发的张力也就消失了,他们之间可以更平等地注重感情交流和心灵沟通,让亲情、友情成为家庭关系的主旋律。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父母往往想方设法和儿女多交流、拉近距离,有意找儿女也感兴趣的话题去交谈,以此培养跟儿女的感情,而不是像在传统中国家庭里的“因为你是我儿子,所以你喜欢不喜欢都必须对我有感情”。美国家庭里,正因为生小孩是出于感情、出于对小孩的爱而不是“养子防老”,生小孩后不会不去养他,因为生小孩本身就是他们自己的偏爱,不是被经济原因迫使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往往不能理解美国人领养别人的小孩后会照样那么去爱他们,而且不分男孩女孩,

一样喜欢领养。以往，中国人之所以只认自己亲生的孩子，是因为当生孩子是出于经济目的时，自生的孩子在儒家“三纲”之下更靠得住（交易更安全），而领养别人的孩子到时候难以靠得住，可能没有投资回报（交易不安全）。

美国家庭文化没有一套名分责任安排，因此不会强制人去无条件地“孝顺”、“听话”，他们强调的是自由选择，是自愿照顾老人、兄长。换言之，儒家文化会通过向你不断提醒你欠这个多少、欠那个多少，逼着你在内疚得无地自容的情况下去给照顾过你的人以回报；在美国，后代和亲戚更多会因为爱你而自愿给你帮助，不会因为内疚去给你“孝顺”。中国以往的模式是后代供养长辈，而且往往引起后代之间互相推诿责任；在美国，是长辈总想给后代留下多少遗产，并且是自愿的。

从表面看，在金融市场把经济交易从美国“家”中剥离出去后，没有了那些你来我往的经济交换，家庭关系好像很没有“人情味”，特别对于习惯于儒家文化的人可能更是如此。实际上，如果儒家的本意是要把家庭建成一个不“言利”、以纯感情维系的基本社会细胞，那么由市场取代家的经济功能才是最好的药方，这样，个人空间才能达到最大，他的精神世界才可更自由地拓展，精神生活才可以丰富。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或许就是这种改良后的儒家社会，这是否也是中国的走向？

### 中国文化的出路

“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自由、民主、法治思想。回过头再看，当时的思想先驱至少在两方面存在盲点，其一是私有产权，其二是发展金融与保险市场，这二者是实现自由、民主、法治的经济基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自己的私有产权而是靠“领导批准”谋生，那么个人就没有声张自己权利的财产基础，自由、民主、法治当然无从谈起；如果没有市场提供的保险与金融品种让你去规避自己一辈子的生活风险，那么在你打倒“孔家店”、失去了“家”这个传统的互助保障体系之后，你会对未来充满着不安，这时你也不会有底气去争取个人的自由与民主权利。如果没有这两类经济基础，打倒“孔家店”之后，你又不得不重建“孔

家店”。也正因为 80 几年前的思想先驱以及后来者都缺乏这种认知，所以，那之后的政权还去试过不同的制度安排，甚至走过与这两个基础要素完全相反的路，到最后当然就无法实现“五四”民主自由理想。

这些认知盲点的确也跟中国学术历来轻“术”的传统有关，因为经济学、金融学都是太低级的“术”，所以，看不到这些也不奇怪。遗憾的是，时下的新儒家学者还是不能走出用文化来谈文化的圈圈，特别是以儒家文化来评价儒家文化，其结论当然不会是别的，用“四书五经”来看“四书五经”，只能是越看越美。如果脱离传统儒家社会的实践现实，不去研究特定文化背后的成因（特别是经济成因），不能看到儒家体系只是多种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一种，那么得出“以中华文明整合世界”这样的认识就不奇怪了。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而西方文化则不然。——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重视“家”，只是追求的“家”的境界不同。传统中国的“家”侧重强制性的经济交易功能，西方社会的“家”侧重基于自愿的感情交往功能。在处于温饱与饥饿之间的农业社会里，生存是一个永恒的挑战，所以“家”的功能很难超出利益交易和保险互助，温情脉脉会过于奢侈，这种社会可能必须要有“刚性”的家庭结构，要阉割个性，否则“家”之内的经济交易就很难有确定性，这就是儒家以及任何传统农业文化的共性。在近代西方社会的生产力上升、人们的收入超出温饱之后，“家”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保险市场来胜任，这时的“家”文化没必要那么“刚性”，也不必约束个人的自由，因为感情的交融是逼不出的，只有基于个人权利、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家”里，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交流才是自愿真诚的，才不是出于“义务”责任感而为的。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儿女都会照顾父母老人，只不过前者可能更多出于“义务”责任感，而后者是出自“爱”，差别即在此。

儒家学者说，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更侧重精神生活的境界。——这种结论很难站住脚。儒家文化强调压抑个人世界、阉割个性，让你只知道你的名分，让你丝毫不能有质疑、挑战长者或权威的动向，让你只能按照士大夫给你设定的麻木人生去过日子。相比之下，西方“家”文化已经走出利益交易功能，强调的是

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让你根据自己的偏好和世界观去不受制约地最大化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种是被阉割个性的精神文明,另一种是个性自由被最大化了的精神文明,哪种境界更高、更能丰富人生之体念?

从北京、丹东这样的大中城市的文化观念变化中,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证券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大中城市的“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经济功能也逐步由金融市场取代,看到儿女时父母首先想到的不再是自己的投资和养老保障,也不再把儿女当成自己的财产,“家”已主要是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的地方。家庭生活不再死气沉沉,而是越来越有个性,父母跟子女间的交往也日益平等,个人自由在中国终于有了更好的基础。这是中国主流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社会,人类的制度性文化总在随着生产力和金融市场而演变,其整体方向是个人自由空间的最大化,发展就是使个人自由。最初在生产能力低下时,人是迫不得已接受部落公有制,牺牲个人与家庭;一旦农业使人的独立生存能力稍微提高,人们的基本生活单元就从部落归缩到宗族、家族,然后再归缩到离个人更近的“家”;到了工业社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温饱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将经济互助交易功能从家庭剥离出,使个人从家庭的经济制约中得以解放,给他以最大自由追求自己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解放了个人。北京、丹东等大中城市文化观念的变迁即证明人类追求自由的自然倾向,这一点不会因人种而异。因此,在今天的发展水平上,儒家基于“三纲”的家文化和由此延伸的政治哲学可以休矣。

文后语:当然,像前面谈到的“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之类的呼吁已不是第一次。据袁伟时先生在《告别中世纪》一书中所讲,早在1901年,也就是在鸦片战争败给英国、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义和团运动让中国败给八国联军之后,就在清朝廷被迫逃命到西安、中国自己身处亡国危机的时候,辜鸿铭先生声称“...人类未来文明...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以中华文明拯救世界的呼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进一步达到高潮,其中梁启超的言论尤为突出,“我希望我们可爱的年轻人,...把

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充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 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全人类都得到他的好处。... 我们的年轻人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前辈们的超脱和大公无私当然令人敬佩，但是这些勇敢背后可能难以找到学理基础。1901年和1919年前后，都是中国自己国难当头、国家前景渺茫的时期，那时还主张拿让中国走到那种亡国境界的文化体系去救他国的命，这的确需要超强的勇气。另外一种解释是，中国传统学问存在根本性的“实证”盲点，让文人把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遭遇跟中国文化脱离开来，认为那些落后挨打不是传统中华文化所致，而是由外国人所致。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情况跟那时期正好相反，中国经济今天正在崛起，这时我们只愿意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归结于中华文化，跟世界整体发展无关。也就是说，如果自己处境不好，那是别人强加于我的；如果我们成功，那完全是自己的功劳。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的文明似乎总是上等的。于是，在中国经济今天处于崛起势头时期，再次听到“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就不奇怪了。

但是，在我们对制度文化的成因有更深入了解之后，“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的口号是否还显得有意义呢？

## 悦读主张

《精文悦读》倡导一种快乐益智怡情的阅读原则。我们希望搭建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一个言说自我的空间。作为对公司领导核心理念的延伸解读，《长短书》的写作任务由编辑部承担，形式体例上也参照正式文体，彰显我们应有的严肃紧张；其余文章，我们本着愉悦身心、放飞梦想、书写心灵的原则，竭诚欢迎赐稿。赐稿可以是推荐书籍或荐品好文，可给予采访机会或提供线索，可对上期刊物进行短评或者对办刊批评建议。一句话，让我们一道，在阅读中感受知识的价值、在表达中增进文化的体悟、在分享中展示精文的魅力。

编辑指导：史支焱 责任编辑：戴明朝

TEL：86-21-64335353

FAX：86-21-64679515

E-mail: mzhidai1010@jingwen.com.cn